

近世初期日本禪僧南浦文之（1554-1620） 詩文集集中的東亞圖像與個人生活

邱怡瑄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級研究員

中文摘要

南浦文之（1554-1620）為桂庵玄樹（1427-1508）四傳弟子，曾從一翁玄心（1507-1592）兼學儒、禪，又向渡來人黃友賢（1538-1610）習《周易》與諸經，精通章句訓詁，被視為薩南學派健將。身為臨濟宗的禪僧與學問僧，學界對文之「學問僧」身分映現的思想意義多所關注，但較少觸及他身為「禪僧」的生活面向。以學問僧角度觀之，南浦文之在訓點中展現以宋學新注說法為據的思想傾向，與其強調儒禪一致、重視修為教化等思想特徵，皆表現禪僧儒學與薩南學派的學術特色。其於慶長薩琉戰爭中，展現綜理外交文書、往來斡旋諸國勢力的才能，亦體現學問僧因掌握「佛學」及「漢文」兩種學問載體與思想中介，故能於東亞交流史中扮演關鍵角色。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本文以日本國會圖書館藏寬永二年（1625）古活字本《南浦文集》、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所藏慶安二年（1649）中野道伴刊《南浦文集》等刊本，搭配鹿兒島大學玉里文庫藏《南浦文集》、《南浦棹歌》、《南浦戲言》諸鈔本文獻，相互補正考訂。從不同文集版本收錄文獻之差異，正可補充南浦文之身處世情

與修行間，其公私之間的生命閱歷與思想風貌。大抵而言，刊本系統的《南浦文集》，更集中展現他出仕任官、綜理文書、商討儒學的公務面向，此亦當前學界對南浦文之形象的主要認知。鈔本系統則更集中表現文之對修行生活、歸隱山林的懷念嚮往。透過不同版本的文集文獻之整理，可更清楚勾勒南浦文之個人的思想面貌，亦對近世江戶學術史中，僧侶掌握的文化中介角色，以及其對於修行的自我定位，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與探討。

關鍵詞： 南浦文之、薩南學派、江戶學術、學問僧、薩摩

The East Asian Imagery and Life in the Collected Poetry of the Early Modern Japanese Zen Monk Nanpo Bunshi (1554-1620)

CHIU, Yi-hsuan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Deapar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Nanpo Bunshi 南浦文之 (1554-1620) was a fourth-generation disciple of Keian Genju 桂庵玄樹 (1427-1508), who studied Confucianism and Zen Buddhism under Ichio Genshin 一翁玄心 (1507-1592). Further, he studied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other classics under Kō Yūken 黃友賢, an immigrant from China. His mastery of textual research made him an iconic figure of the Satsunan 薩南 school. Scholars tend to focus on Nanpo's identity as a scholar-monk (*gakumonsō*) in the Rinzaï lineage of Zen Buddhism. However, his life as a Zen monk has received surprisingly little scholarly attention. As a scholar-monk, Nanpo's *kunten* annotations of Chinese texts demonstrate intellectual influences from the Neo-Confucian new exegetical tradition. This, along with his emphasis on the unity of Zen and Confucianism and his stress on the concept of practice as a form of teaching are intellectual hallmarks of Zen-Confucianism and the Satsunan School. In addition, his article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matchlock gun (*hinawajū*) into Japan, as

well as his proficiency in diplomacy and mediation during the invasion of Ryūkyū by the domain of Satsuma, epitomized scholar-monks who occupied a pivotal role in East Asian exchange history for they mastered two knowledge carriers and ideological interfaces: Buddhism and Chinese language. Relying on the foundations of previous scholarship, this study undert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 editions of the *Nanpo Anthology*, along with related literature such as *Songs of Boatmen* and *Witty Stories*. The analysis reveals critical distinctions among these different editions, which in turn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Nanpo's life experiences amid worldly engagement and transcendental practice. Generally speaking, the printed edition of the *Nanpo Anthology* focuses on his official career, literary work, and discussions on Confucianism, representing the dominant image of Nanpo held among scholars today. By contrast, the handwritten manuscript edition highlights his wistful yearning for religious practice. By collating and analyzing the literature from the *Nanpo Anthology*, this study not only brings forth the contours of Nanpo's thought, but also contributes to modern Edo studies by further exploring the Buddhist clergy's role as cultural intermediaries and their self-identification as religious practitioners.

Keywords: Nanpo Bunshi, Satsuman School, Edo studies, scholar-monk, Satsuma domain

一、前言：漢文文獻裡的南浦文之

南浦文之（1554-1620）法名玄昌，是以諸多文獻又常稱其為「文之玄昌」，日本臨濟宗僧人。文之俗姓湯佐，生於南鄉外浦（即平安時代日向國宮崎郡之飢肥鄉，現為日本宮崎縣），故號曰「南浦」。¹文之幼年即以寺院為家，十二歲時脫白，因其天資穎異，有「文殊童」美譽。²文之於龍源寺從一翁玄心（1507-1592）兼學儒、禪，成為薩南學派開山祖師桂庵玄樹（1427-1508）四傳弟子。

南浦文之最為人推重處，在於能充分體現近世東亞佛教中，佛教作為「學問津筏」的特徵。無論儒學、禪學，乃至漢文學推廣，以及居於其間的文化轉譯，他皆居功厥偉。除了繼承薩南學派一貫儒、禪兼修的學術傳統外，他自渡來人黃友賢（1538-1610）處習《周易》及諸經。³點定《四書章句集註》和《周易傳義大全》等書，亦成為影響江戶儒學至

※ 收稿日期 109.6.18，通過審稿日期 109.8.31。

¹ 關於南浦文之的傳記資料，多以伊地知季安（1782-1867）《漢學紀源》的記載為基礎。伊地知季安本身就是薩摩藩士，對薩南學派源流始末知之甚詳。本文關於南浦文之生平略歷，除其文集中自己提及外，多據《漢學紀源》而來。見伊地知季安，《漢學紀源》卷5，東京：歷史圖書社，1971年《新薩藩叢書》本，頁443。另日本文部省編《日本教育史資料》時，亦編述簡略小傳。見文部省編，〈僧文之小傳〉，《日本教育史資料》卷12，第5冊，東京：鳳文書館，1988年自初版明治23年（1890）復刻，頁443。

² 南浦文之幼年經歷相關細節，除前註文獻載述外，本文復以《南浦文集》中〈寄僧徒詩〉自序為據。南浦文之於此序自述云：「予生六歲之時，老父令予入天澤老師之室，以作僧苗。」見南浦文之，《南浦文集》卷下，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慶安二年（1649）中野道伴刊行本（以下簡稱《南浦文集》〔慶安本〕），頁65b。

³ 關於渡來人黃友賢（又稱江夏友賢，取其祖籍為福建江夏之意）之介紹，可見伊地知季安，〈黃友賢第三十五〉，《漢學紀源》卷3，收入《新薩藩叢書》冊5，頁430-440。《南浦文集》收有〈和友賢老詩序〉，其詩序對黃友賢經歷有詳細介紹。南浦文之，〈和友賢老詩序〉，《南浦文集》（慶安本）卷中，頁37a-38a。

今深遠的訓點本——「文之點」，頗有功於日本朱子學及易學的推廣奠基。除以禪僧角色而對日本近世儒學產生深遠影響外，南浦文之仍維持緇流本色。他十五歲上京，為東福寺龍吟庵熙春龍喜（?-1594）之嗣法，慶長七年（1602），受薩摩藩主島津家久（1576-1638）託請，創建大龍寺。慶長八年（1603），復依島津氏囑咐進謁德川家康（1543-1616），並於建長寺秉拂上堂。慶長十六年（1611）正式擔任大龍寺開山住持。南浦文之卓越的詩文才能亦不容忽視。他所以號「文之」，係因相國寺仁如集堯（1483-1574）贊畏其文才，故書「文之」為其號。只是他文學上的成就，在當前學術研究脈絡中，始終被他其他方面之盛名所掩。相關前行研究強調其外交才能及儒學、經學方面的貢獻，反較少觸及其文學對個人生命內造境界的展現。⁴直到他元和六年（1620）年示寂為

⁴ 中文學界最早對南浦文之進行深入探討者，當推廖肇亨。他注意到南浦文之在薩摩進攻琉球時，是眾多外交文書之起草者。此外南浦文之與泊如竹（1570-1655）的詩文往來，亦藏有許多珍貴琉球史料。見廖肇亨，〈南浦文之與琉球王國〉，《倒吹無孔笛：明清佛教文化研究論集》，臺北：法鼓文化，2018年，頁143-177。除了參與薩摩、琉球、明朝涉外交流的脈絡外，因薩南學派在日本儒學史中，有首倡宋學，奠基朱子學之功。日本學界對南浦文之個人思想的研究，亦多以儒學史角度切入。陳威璿點出：日本學者多從日本宋學史或禪僧儒學角等角度，推介南浦文之的儒學貢獻。如井上哲次郎，《日本朱子學派之哲學》，東京：富山房，1937年，頁650-655；西村天囚，《日本宋學史》，東京：梁江堂書店，1909年，頁235-264；大江文城，《本邦儒學史論攷》，大阪：全國書房，1944年，頁61-78；足利衍述，《鎌倉室町時代之儒教》，東京：日本古典全集刊行會，1932年，頁568-574；久須本文雄，《日本中世禪林の儒学》，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92年，頁267-275等論著。但南浦文之留下著作以訓點為主，不易深入討論其儒學體系。不過村上雅孝仔細查考過《周易傳義大全》的文之點，指出南浦文之有以宋人新注說法訓點周易的傾向。見村上雅孝，〈文之玄昌と宋学——「周易伝義大全」の書き入れを通して見た——〉，《文化》57，1994年，頁165-182。陳威璿除了梳理中、日關於南浦文之之研究脈絡外，更深入《南浦文集》，抽繹其中儒學思想的內蘊，指出其有堅持學貴自得、強調佛儒一致、重視教化等思想特徵。見陳威璿，〈日本近世初期禪僧朱學思想釐探：

止，南浦文之無論宗教或外交事務上皆深受仰戴，也獲得島津家的信任倚重。其淵博的學問僧形象，說明日本佛教文化在江戶學術史上，不只是人們尋求精神安頓的出口，更是打開廣袤知識世界、促成文化交流的敲門磚。

南浦文之傳世詩文，主要見於《南浦文集》、《南浦棹歌》、《南浦戲言》諸書。⁵其中《南浦文集》最為常見，此書亦為南浦文之留存後世著述中，除訓點文獻外流通較廣者。根據日本國會圖書館貴重書誌載錄，《南浦文集》最通見版本，為慶安二年（1649）中野道伴刊行本，此書應係據更早之寬永本為基礎加以重刊而來，全書各卷標明收錄順序。⁶惟寬永年間，亦已存在兩種版本以上的《南浦文集》。以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所藏慶安二年中野道伴刊本為據，其下冊書末所附跋語稱寬永六年（1629）（原文是寬永己巳季秋）時，文之弟子已編次包括《文集》一卷、《詩集》一卷及《戲言》一卷等文獻。然而實際閱讀慶安二年本各卷目錄及其實際收錄內容，此本中被標為《南浦文集·卷之中》的收錄範圍，似已包括應屬《詩集》之內容；且《詩集》和《戲言》之分野

以薩南學派南浦文之為例》，《國文學報》65，2019年，頁265-294。綜上，無論中日，前行研究不約而同皆論及南浦文之扮演轉譯不同學術脈絡的貢獻。

⁵ 本文引用南浦文之詩文集資料，除據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所藏之慶安二年中野道伴刊本（此本較寬永活字版晚出，內容加上訓點，且各篇有標順序）外，亦另據日本國會圖書館藏寬永二年（1625）古活字本《南浦文集》（以下簡稱《南浦文集》〔寬永本〕）加以對照覆核。另有數本影印自鹿兒島大學圖書館玉里文庫之鈔本，題名分別為《南浦文集》（以下簡稱《南浦文集》〔玉里本〕）、《南浦棹歌》及《南浦戲言》等。這批鈔本年代不詳，不著頁碼，但有不少所收詩文未被前述兩刊本收錄，是以頗為珍貴。在此也特別向惠予借閱珍貴資料並給予諸多撰寫建議的廖肇亨教授謹致謝忱。

⁶ 《国国会図書館所蔵貴重書解題巻2》，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1969年，第4冊。見日本國會圖書館網站，<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2532156>，2020/5/20。

亦不甚明確。但慶安二年本配有訓點，且各卷各篇皆標明收錄順序。只是從跋語與內文的落差看來，此本恐仍存在內容淆亂的問題。考其跋語云：

《南浦戲言》，前建長文之老師薩州人之所作也。……老師在世之日，以所自著之詩文，使予謄寫焉。然詩與文混雜，而不分其部類，不定其卷秩。辭世之後，予始表章之，又編次之，別為三卷。
《文集》一卷、《詩集》一卷、《戲言》一卷今壽之於梓，以遺愛於後昆云，寬永己巳季秋下澣末裔。⁷

跋語稱文之為「老師」，可推知《文集》、《棹歌》、《戲言》諸文獻，皆係曾親炙文之的弟子為其謄寫編定。但文中云「予始表彰之，又編次之，別為三卷」，又跋文開頭即云有《南浦戲言》等，都與現今可見之中野道伴刊本內容未能合轍。將此本與日本國會圖書館收藏，原屬日本漢學家土肥鶚軒（1866-1931）舊藏的寬永二年（1625）古活字刊本《南浦文集》互相比對，雖然二者之收錄內容大同小異，分為「卷之上」、「卷之中」、「卷之下」的做法亦大抵類似，但仍存在分卷範圍和收錄內容的落差。細按慶安二年本內容，《南浦文集》上、中、下之分卷，應已非編次時之本來面目。其《詩集》內容被混入文集，而「卷之下」，亦有不少原係出自《南浦戲言》的內容。

稽考寬永二年古活字本《南浦文集》，其「卷之上」收錄自〈眾樂記〉到〈淨光明寺上梁文〉，順序與中野道伴刊本的「卷之上」相似，但多出題為〈記夢〉一篇。且寬永二年本諸篇，文後皆綴有文章寫定年月，對考訂文章先後順序，頗具參考價值。寬永二年本「卷之中」，則收錄自〈革翁號說〉至〈呈佐鋪王子書〉等文，其「卷之下」則自〈和友賢老詩序〉為始，最後兩篇收〈與恭畏閨梨書〉和〈砭愚論〉兩篇與

⁷ 南浦文之，《南浦文集》（慶安本）卷下，頁 68a-b。

恭畏爭辯《論語》內容注釋的文章。唯此卷除末二篇批評恭畏的文獻外，所收皆屬詩作。⁸中野道伴刊行的慶安二年本，收錄內容則與此稍異。慶安二年本將〈自和友賢老詩序〉收於「卷之中」，順序在〈呈佐鋪王子書〉後，其後包括〈答貞昌公詩〉在內的二十篇詩作及其詩序，亦皆收錄於「卷之中」。慶安二年本的「卷之下」，則自〈辨閭問答記〉起，收錄文獻順序及內容，皆已與寬永二年本大相逕庭，兩刊本內容互有參差短長。

又玉里文庫亦有以鈔本形式保存的《南浦文集》，但此鈔本無目錄，鈔輯順序也頗殊異於慶安二年本和寬永二年本兩種系統的《南浦文集》，且多出大量刊本未收錄的詩作。玉里文庫所藏的南浦文之著作，形製皆屬鈔本，鈔定年代則未詳，亦未標明頁數及卷次，引用上較不方便。內容則詩文淆雜，不分部類。但寬永二年本有收，慶安二年本未收的重要儒學經典論辯文獻〈與恭畏閤梨書〉與〈砭愚論〉二文，則可見於鈔本。從文獻來源推論，玉里文庫與薩摩藩島津家舊藏高度相關，這批文獻裡的南浦文之著述相當值得重視。⁹種種現象顯示，在現存有關南浦文之的文獻中，因版本之異所產生的互見、未收、佚文等情形，所在多有。倘未針對所有版本進行全面性比對，所得到的南浦文之形象和

⁸ 陳威璿認為慶長十四年（1609）恭畏拜會文之時，二人在《論語》字詞解釋上產生的激烈論辯內容，可於〈與恭畏閤梨書〉和〈砭愚論〉得知。見陳威璿，〈日本近世初期禪僧朱學思想釐探：以薩摩學派南浦文之為例〉，頁272-273。陳威璿係據鹿兒島大學圖書館玉里文庫所藏鈔本指出慶安二年刊本《南浦文集》未收這兩篇文獻。但筆者發現寬永二年本《南浦文集》亦收有〈與恭畏閤梨書〉和〈砭愚論〉。

⁹ 可參見龜井森、丹羽謙治等撰寫之〈玉里文庫概要〉及〈玉里文庫善本趣旨〉，收入龜井森、丹羽謙治等著，《平成28年度鹿兒島大學附屬圖書館貴重書公開「玉里文庫善本展——国文学・薩摩・近衛家・蘭学・琉球——」圖錄》，<http://hdl.handle.net/10232/00029461>，2020/9/28。

學術探討，恐亦未能稱作整全。南浦文之的傳世文獻，應宜重加編次及校勘，始能呈現他個人更完整的思想學術與詩文創作成績。

根據慶安二年本卷末跋語，南浦文之創作詩文時，常自號雲興、懶雲、狂雲等，不僅取用「龍吟雲興」意象，亦頗見其嚮往超曠之意圖。¹⁰而將玉里文庫鈔本文獻中的《南浦棹歌》、《南浦戲言》納入視野後，則會發現相較於刊本系統，南浦文之的漢詩文創作顯得更加類型多變且質量可觀。南浦文之不僅文風汪洋縱恣，還能時見其生活中品茗、觀花、村居之雅趣閒情，展現禪林文學與生活充分結合的特徵。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本文期許能更全面探勘其所留存的詩文材料，藉由此一個案的深入探討，更全面地理解和勾勒江戶僧侶身為「文化中介者」的思想及生活風貌。漢詩及漢文，向來都是構成東亞知識階層共同知識體系的重要載體。南浦文之的生花妙筆和淵博漢文造詣，不只鋪平宋學注疏傳入日本的道路，也打開東亞文化相互溝通理解的窗口。由於刊本文獻輯錄詩作明顯少於鈔本系統，但又互有出入，未能只憑一種版本為據。本文接下來的討論將以刊本系統的寬永二年本和慶安二刊本交互參酌，並納入玉里文庫鈔本系統的《南浦文集》、《南浦棹歌》、《南浦戲言》相互對照，用以觀察南浦文之詩文創作裡所勾勒出的知識風景與生活面貌。

¹⁰ 與前引跋語段落相同，但前揭獨立引文所省略之字句，旨在敘述南浦文之的師承、身世等。其云：「諱玄昌，南禪大明祖九世之遠孫，而桂庵翁四世之的孫也。老師生于日州南鄉外浦，故自名南浦，又東福龍吟庵之門葉也。故其軒号雲興，蓋取于龍吟雲興之義也。或曰懶雲，或曰狂雲，皆其義也。」參見《南浦文集》（慶安本）卷下，頁 68a。

二、身處世界中的文化轉譯者

眾所周知，近世東亞文明開放、多線而頻密的交流網絡，正是由使節、海商及僧侶這些「文化中介者」所共同開創。¹¹南浦文之無疑可作為這類中介者中的典範人物。他才學俱優，深受島津家信賴器重，也因戰國諸藩有起用僧人執掌外交文書職務的傳統，他也才能參與諸多與政策、通商、文教往來方面相關的公共事務。¹²南浦文之嫻熟「漢文」這一傳播東亞的知識載體，而當時多采多姿的東亞世界，正是以「漢文」為媒介，互相瞭解並開啟交流。尤其薩摩藩居於海上交通貿易與文化交流的樞紐，可謂近世日本面向世界的重要門戶。身為「樞紐之樞紐」的南浦文之，遂在如此機制下，成為交流史中不可忽視的關鍵人物。

根據伊地知季安《漢學紀源》裡的相關記載，加上《南浦文集》亦

¹¹ 關於使節在近代東亞文化交流史產生的關鍵作用，可參考夫馬進或吳政緯根據朝鮮使節留下文獻所進行的系列探討。見夫馬進著、伍躍譯，《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使節視野中的中國・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吳政緯，《從漢城到燕京：朝鮮使者眼中的東亞世界》，臺北：秀威資訊，2017年。而以東亞的海商、商船、貿易、漂流船等為核心關注，觸及中、日、琉等關係者，則可參考松浦章的研究。見松浦章著、孔穎編譯，《海上絲綢之路與亞洲海域交流（15世紀末-20世紀初）》，鄭州：大象出版社，2018年；松浦章，《江戸時代唐船による日中文化交流》，京都：思文閣，2007年。關於僧侶對於近世東亞文化的形塑，則可見徐興慶、劉序楓編，《十七世紀の東アジア文化交流：黄檗宗を中心に》，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年。或對於使節、海商、僧侶等不同角色在東亞文化交流使中擔任文化轉譯角色的討論，亦可參石守謙，〈中介者與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及廖肇亨，〈中介、轉接與跨界——東亞文化意形塑過蠡探〉，二文收入石守謙、廖肇亨編，《轉接與跨界：東亞文化意象之傳佈》，臺北：允晨出版社，2015年，頁1-16、頁17-30。

¹² 見伊藤幸司，《中世日本の外交と禪宗》，東京：吉川弘文館，2002年，頁70-104。或羅麗馨亦對當時的隨軍僧侶任務有所探討，見羅麗馨，〈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日軍軍中的傳教士與僧侶〉，《漢學研究》33：1，2015年，頁163-198。

確實收錄包括〈呈大明天使書〉、〈與大明商客書〉、〈與大明奕吾子書〉、〈與大明福建軍門書〉、〈與蠻君書〉、〈答蠻君書〉、〈答南蠻船主書〉、〈答南蠻四國老書〉、〈寄呂宋國船主書〉、〈答安南國書〉、〈答琉球國王書〉、〈呈琉球國王書〉、〈呈琉球三司官〉等大量具外交性質的文書。¹³此中涉及當時薩藩對明朝、呂宋島、安南、南蠻（葡萄牙）等諸方勢力的招商及往來斡旋，乃至對明朝的通商通使訴求、對琉球的懷柔招安等。南浦文之居間扮演的，不僅僅是「執掌文衡」的角色，還相當程度參與了這個「走向世界」的過程。這些外交文書之所以採用漢文撰寫，也隱隱然指向「漢文」確實是當時溝通世界的重要媒介。¹⁴另外南浦文之撰寫

¹³ 這批外交文書收錄於《南浦文集》卷中，撰作年月從慶長十一年（1606）到慶長十八年（1613）。寬永二年本保留較完整的撰作年月信息，慶安二年本則加上訓點。玉里文庫鈔本亦有收錄，但有零星文獻未收（如〈答安南國書〉未見於玉里文庫本《南浦文集》）。這批文書多係為島津藩代表人島津家久（1547-1587）與島津義弘（1535-1619）所作，原始署名多署藤原家久或藤氏義弘等。又寬永二年本多出元和二年（1616）撰寫的〈須知〉，公示大明商船日本停船之慣例與規定。見《南浦文集》（寬永本）卷中，頁 31。這批文書文辭清雅，內容包括請求及討論通商事宜，或討論漂海者後續處理方法等。其中不乏充分表達其文辭與學問素養者，如代表藤原家久覆信於當時呂宋國王的〈與蠻君書〉，開篇即引用《周易·繫辭》云：「《周易》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聖人之言，百世豈可廢哉？我聞呂宋之為地，國富民豐，而南商北賈，往還如織，不亦繁華之地哉！」見〈與蠻君書〉，《南浦文集》（慶安本）卷中，頁 14a。或《南浦文集》（寬永本）卷中，頁 26-27。又如，在〈與大明福建軍門書〉中解釋出兵琉球原因後，提出與大明之間「一以使日本商船許以容之大明邊地，二以使大明商船來我小邦交相貿易，三以使一遣使年年通其貨之有無，匪翹富兩國人民，大明亦無為倭寇嚴備兵衛矣」的訴求。都頗見南浦文之嫻熟於外交文辭的能力。〈與大明福建軍門書〉收入《南浦文集》（慶安本）卷中，頁 12b-14a，引文見頁 13b；另見於《南浦文集》（寬永本）卷中，頁 25a-26a。

¹⁴ 如其〈答南蠻四國老書〉云：「胡越天涯，未通音書，不意芳信，數行蠻字，不知其旨趣如何，使人重譯，以漸解其理者，十而一二，其八九未能解之。」則

的〈鐵砲記〉，也是其文集中最為馳名的作品。¹⁵此文不僅成為西方火器傳入日本的標誌，也被視為日本近世史中，具劃時代意義的歷史紀錄文獻。

在〈鐵砲記〉裡有個相當耐人尋味的細節。根據其文，在這艘載有百餘名歐籍船員的海船上，最先打開溝通門戶的，是其中一名叫做「五峰」的「大明儒生」。船員與種子島上居民的溝通，也先由島上「頗解文字」的西村織部丞首先嘗試「以杖書於沙上」進行提問，五峰旋即亦「以杖書於沙上」應答之。¹⁶在這篇文章記載之脈絡下，一切交流都是從「文字」筆談開啟。南浦文之對「鐵砲傳來」的撰文介紹，綜合了漂來民、蠻夷、筆談等現在東亞交流史中，諸種不可或缺的元素——通過南浦文之的文字記載，我們仍可得證一個簡單道理：文明中所有偉大的發現與進展，往往起之於微末。無論〈鐵砲記〉是否只是歷史傳聞，並不妨礙我們認知，在這巨大歷史轉捩點前，歐洲商船與日本島藩彼此賴以溝通的媒介即為「漢字」。¹⁷這一看似微末，卻至關重要的溝通橋樑，

知當時國際間的往來文書，若非以漢文通信，則殊難找到解人。見《南浦文集》（慶安本）卷中，頁 16a-b。

¹⁵ 三刊本文獻所收的〈鐵砲記〉文字一致，以下所引用〈鐵砲記〉內文不再個別引註出處。見南浦文之，〈鐵砲記〉，《南浦文集》（慶安本）卷上，頁 4b-9a。

¹⁶ 見南浦文之，〈鐵砲記〉，《南浦文集》（慶安本）卷上，頁 4b-9a。

¹⁷ 〈鐵砲記〉記述關於種子島的「鐵砲傳來」事件，已形成日本近代史中關於火藥傳播的常識化說法。但由於是將傳聞寫成文字，當中不免帶有主觀臆斷或文寫描寫成分。村井章介在《世界史のなかの戦国日本》、《日本中世境界史論》對此文有較深入介紹。參見村井章介，《世界史のなかの戦国日本》，東京：筑摩書房，2012 年；村井章介，《日本中世境界史論》，東京：岩波書店，2013 年。不過類似這種特定器物來自單一來源的說法，多少都帶著一點建構神話的色彩。近來也有學者就物質史的觀點，對此單一來源說提出質疑。見宇田川武久，〈ふたたび鉄砲伝来論：村井章介氏の批判に答える〉，《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190，2015 年，頁 1-28。

就如同文化溝通的種子。南浦文之接受的完整漢文教育，使他有能力繼承薩南學派一向以來擔當的文化轉譯者角色——讓來自外部的知識與文明，透過漢文被轉譯進來，也使用漢文向世界發聲。換言之，南浦文之通過掌握「漢文」載體，擔任了「窗口」與「文化轉譯者」。此猶如明代耶穌會傳教士掌握漢文後，能將西方的知識及科技，轉譯進當時的中國文化裡。南浦文之於近世日本，扮演的正是這樣的知識轉譯者。文集中的陳述和記載，雖不能替代官方文書或檔案，成為客觀性鐵證，但確實能幫助我們理解當時世界怎麼思考關於世界轉變的過程。接下來，本文也將以南浦文之詩文集中，幾組較少為前人注意的文獻，一探這位東亞近代文化史上重要人物的獨特眼界，以及他所經歷的世界變化。

三、僧侶筆下的戰爭視界

戰爭是以毀滅為成就的活動，所謂「兵者，不祥之器」，戰爭不免帶來死傷與離亂。¹⁸然而我們身居其中的世界，恰恰便誕生在一次次毀滅後的餘燼中。南浦文之生值近世東亞歷史中風雲詭譎的硝煙年代。當時影響東亞史最為深遠的歷史事件，當屬被稱作「萬曆朝鮮戰爭（1592-1598）」的「文祿慶長之役」。這場牽連中、朝、日三國軍事力量的東亞大戰，戰情空前激烈，可謂是波瀾壯闊的一卷史詩級戰爭。¹⁹而

¹⁸ 參見《道德經》三十一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也，物或惡之，故有道不處。」見朱謙之撰，《老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123-124。

¹⁹ 此一戰役對十六世紀末的東亞局勢影響甚鉅，中、日、韓三地學者，亦各自從不同視角關注此場戰役。如崔官著，金錦善、魏大海譯，《壬辰倭亂——四百年前的朝鮮戰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池內宏，《文祿慶長の役》，東京：吉川弘文館，1987年；北島万次，《豐臣政權の對外認識と朝鮮侵略》，東京：校倉書房，1990年。近年來學者逐漸突破由日本、朝鮮、中國三方各自國別史的視角來理解此場戰爭，而逐漸以「東亞」這一觀點來看待。如李啟煌，《文祿・慶長の役と東アジア》，京都：臨川書店，1997年；鄭潔西，

稍後發生在 1609 年的慶長琉球之役，也即薩摩藩吞併征伐琉球的戰爭，規模雖不若前者，戰爭範圍和主要牽動的國際勢力，也僅只在薩摩藩與當時還被稱為中山王國的琉球島國間。但琉球居於當時海洋貿易的要津，控扼東北亞往東南亞貿易的航道。薩摩藩的侵入，永遠改寫了這個南方島國的命運，也牽動往後薩摩藩在東亞海洋史中，越來越居於核心樞紐的地位。²⁰這些東亞國度因貿易利益、朝貢關係發生的戰役，象徵的不僅是文化圈的資本競爭與征伐野心的相互碰撞，更是東亞秩序裂解與重組前夕的徵兆。

作為戰爭年代的見證者與參與者，南浦文之筆下的戰爭圖景，除反映以上政經勢力的此消彼長外；就他個人而言，也呈現雙重表現層次：一方面他是深受藩主器重，職掌外交文書重任的學問僧，須對政經局勢有最接近現實利益的觀察。作為領主忠貞幕僚，他也必須撰文贊翼王師，使每場征伐皆能「師出有名」。但同時，他也是自幼修持佛法的僧侶。戰爭的殺戮行為，以及征伐後帶來的動亂，他註定無法置身其外，更不能無動於衷。戰爭是基於政治現實的考量，以及爭奪資源的種種慾望所帶來的人間慘禍。對戰爭的紀錄與歌頌戰功之詩，和他對戰爭中被迫戰死沙場生靈們的悲憫，同時存在他筆下。雖然看似矛盾，卻讓南浦文之詩文集集中的「戰爭書寫」，展現出更多元的面向。

羅麗馨曾考察豐臣秀吉（1537-1598）侵略朝鮮戰爭中的隨軍僧侶詩文、日記等，認為除慶念較具厭戰思維，且對信仰活動從不懈怠外，其他僧侶如天荊、是琢明琳、宿蘆俊岳等，通常止於文人的賦詩行吟，

《跨境人員、情報網絡、封貢危機：萬曆朝鮮戰爭與 16 世紀末的東亞》，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 年。

²⁰ 較重要的論著可參考上里隆史，《琉日戦争一六〇九：島津氏の琉球侵攻》，沖繩：ボーダーインク，2009 年；陳武強、郭海東，《明代中國琉球日本三國關係與東亞秩序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7 年。

對戰爭本身缺乏批判。²¹這一撰寫傾向，可和南浦文之的戰爭書寫互為參照。南浦文之書寫的戰爭圖景，因非屬日記題材，恐未若天荊《西征日記》、慶念《朝鮮日々記》那樣全面。²²但其內容，亦不僅只於宣耀軍威、宣傳東亞秩序的政治意圖，亦有弔死扶傷、撫慰人心的內省書寫。他的長詩〈討琉球詩並序〉可視為前者之代表。²³而文之為「萬曆朝鮮戰爭」撰寫的〈弔戰亡文〉，除了以自身視角觀察敘述「萬曆朝鮮戰爭」的始末源流，以及當時戰況慘虐外，其更為特出的一段描述，是其文末能以釋家觀點，憫恤戰場犧牲之性命，以撫慰生靈之責自任。²⁴身處東亞文化激烈交鋒的時代，南浦文之對當時戰役的第一手記錄，顯示他學問與思想的駁雜融通，卻也讓他在这東亞文化圈的碰撞與衝突中，擁有獨特的觀看視野和思想內涵。

（一）既是功業亦是傷亡：文祿慶長之役（1592-1598）

在東亞史中被稱為「萬曆朝鮮戰爭」的這場國際戰役，無疑是十六世紀末改變東亞秩序的重要歷史事件。一直以來，關於如何稱呼這場戰

²¹ 羅麗馨，〈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日軍軍中的傳教士與僧侶〉，頁 188-189。亦可參顧明源，〈壬辰戦争における佐賀の従軍僧是琢明琳について〉，《九州史学》185，2020 年，頁 59-84。

²² 相關文獻可參考天荊，《西征日記》，收入国書刊行会編《続々群書類從》冊 3，東京：続群書類從完成会，1970 年；是琢明琳，《明琳朝鮮役従軍日記》，收入佐賀県史編纂委員会編《佐賀県史料集成》，佐賀：佐賀県立圖書館，1960 年；慶念著、内藤雋輔編，《朝鮮日々記》，收入《朝鮮學報》35，1965 年，頁 55-148。

²³ 南浦文之，〈討琉球詩並序〉，《南浦文集》（慶安本）卷下，頁 59b-62a。此文在玉里文庫的《南浦文集》鈔本中未見收入，反收錄在《南浦戲歌》中。寬永二年本則僅收序文，詩未見。題為〈討琉球詩序〉，卷中，頁 21b-23a。

²⁴ 南浦文之，〈弔戰亡文〉，《南浦文集》（慶安本）卷中，頁 7b-8b。此文在玉里文庫之鈔本《南浦文集》、寬永二年本《南浦文集》卷中俱見收錄，字句皆同，僅文末多出一行「慶長第四春時正之日 敬白」文字。

役的演變過程裡，就已隱藏中、日、韓三方的文化角力與觀點競爭，也各自呈現三國對當時東亞文化秩序的主流詮釋和立場差異。在日方文獻中，這場戰役常被稱為「文祿慶長之役」，強調是由數次「征伐」組成的軍事行動，目標在實現豐臣秀吉建功立業、擴張領土的雄心。韓國方則多稱此戰役為「壬辰倭亂」與「丁酉再亂」，這種由「倭」及「亂」等負面字辭來指涉，即已強調事件本身的「非秩序」與「非常態」——也即在當時的東亞秩序裡，日本嘗試吞併韓國的舉措，無疑是意圖顛覆既有秩序的反悖行為。中國史學界更常使用的字辭則是「萬曆三大征」或「抗倭援朝」戰爭，代表其定位明朝為調停管控東亞秩序統馭者的立場。²⁵一場戰爭的多種詮釋角度，交織出迥然不同史觀。歷史的主觀與客觀，正由這樣的眾聲喧嘩間，方能合奏出多重複調，也呈現不同觀點的歷史詮釋方針。

南浦文之對這場戰役始末經過的描述，昭示他以日本民族觀點出發的鮮明立場。然而這個未經修飾、未刻意泯除主觀立場的第一線觀察，恰恰可暴露出「戰爭」以及「戰爭書寫」的本質。描述戰爭時，人們往往先區分敵我，再決定立場是非。因此中、朝文獻中野心勃勃的豐臣秀吉，在南浦文之筆下卻是心雄志大的韜略將才：

大相國秀吉公武勇過人，聰明盡性，自壯歲有括囊四海、併吞八荒之志。是故日域六十餘州，尺土無非其有，一民無非其臣矣。天正壬辰之春，征伐朝鮮，朝鮮八道悉屬我封疆，獨全羅一道革

²⁵ 由中、日、韓三方對同場戰役的名稱差異，觀察到各自的本國史立場，可參看孫衛國，〈東亞視野中萬曆朝鮮之役的總結與反思〉，收入史學研究與中國史學的風格編委會編《史學研究與中國史學的風格：吳懷祺教授八十華誕賀壽文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頁311-330。

面而不心服。於是大相國今日域諸軍相攸築城，守其藩籬。我薩隅日三州士卒，亦以其命，守要害之處矣。²⁶

文之的敵我意識分明，讓豐臣秀吉的侵略舉措，成為他「武勇過人，聰明盡性」的天性展現，在他「囊括四海，併吞八荒」之雄心志向驅使下，也必將走上併吞他國的道路。這場戰役的「功敗垂成」，似乎也讓南浦文之頗感唏噓。

以前文觀之，南浦文之對豐臣秀吉的霸業雄心，並無任何苛責批判之情，甚至還帶有點樂觀其成的期許。歷史往往以成敗論英雄，後世通常譴責那些終究沒能成功的「侵略者」之罪愆，卻遺忘許多「勝利者」也需承擔雷同的戰爭責任與指控。戰爭文學中這種「妄自尊大」的態度自有可議可咎之處，但也不能忽略這段陳述的贊否立場，主要出自於「區分敵我」的主觀思維而來，而非基於事實的客觀描寫。其實南浦文之心思敏銳，很快就在文章中意識到，戰爭乃「殺伐之事」，必須格外戒慎。但他並未以「戒殺」作為反對戰爭的對策，而是以「戒慎敬事」，作為思考己方參與戰爭的立場。戰爭是既定國策，當中牽涉萬千生命的生死存亡。但由將領所發出的成命對南浦文之而言，他有必須不辱使命的責任感，因此在這段敘述中，他顯然將「成命」看得比「生命」本身更加重要。²⁷

這場牽涉中、日、韓三方軍隊勢力的戰爭曠日費時，過程也高潮起伏不斷，其間一度出現明朝欲與日方訂定和平協議的可能性，也旋因明朝內閣中和戰立場的更迭，而旋遭毀棄。²⁸明軍為了這場不在自己轄屬

²⁶ 南浦文之，〈弔戰亡文〉，《南浦文集》（慶安本）卷中，頁 7b-8a。

²⁷ 南浦文之，〈弔戰亡文〉，《南浦文集》（慶安本）卷中，頁 8a-8b。

²⁸ 明朝在這場戰役中，內閣曾出現和戰立場的角力。趙志皋（1524-1601）、石星（1537-1599）、沈惟敬（?-1597）是主和派，希望用封貢方案以結束戰爭；張位（1538-1605）、沈一貫（1531-1615）、邢玠（1540-1612）則是主戰派，認為

國土內的戰爭受創甚深，幾乎動搖國本。但這段慘酷非常的戰爭歷史，在南浦文之筆端剪裁下，卻變成一道證明日本乃係「天命所歸」的文字紀錄。從這裡不難發現南浦文之有其敏銳之洞察力，卻也有其特定執守的立場。以下是他對於軍士投入戰爭的見解：

夫以師旅之興，以殺伐為事，不無傷財害人，死生存亡繫焉，可不慎乎？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其命不效，故除戎器、戒不虞，以使眾士少不怠於防嚴。丁酉之秋，諸軍合兵再攻全羅道南原，伏尸者數千餘，使我軍斬首者四百二十餘級，是皆以相國之命也。戊戌之秋，大明率數十萬之兵來求和睦，日域諸軍亦相議以和。我泗川亦欲擇日而修會盟。小春之朔，大明兵偽攻我泗川，不得已以戰。當其兵刃既接也，棄甲曳兵而走，我軍士乘勝追亡逐北，伏尸八萬，流血漂鹵。我軍中無亡矢遺鏃之費，是天之所與，而非人力之所能測也。大明諸軍矢竭弦絕，終乞降於我。我獲其將茅國科為質共載，全師而歸。²⁹

南浦文之這段記載，與《明史》中記錄萬曆援朝戰爭「自倭亂朝鮮七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朝與屬國迄無勝算，至關白死而禍始息」³⁰的段落，恰可互相印證。但南浦文之這段「我軍得天之所與」的敘述，表面上看來是出於政治考量的宣傳文字；而結合全文最後一段關於弔死扶傷的記載，無乃是將戰爭勝敗歸諸於「天」命，最後則帶出他希望自己能夠弔祭生靈、撫慰死傷之眾的願望：

必須擊敗日軍，才能保住朝鮮。卜永堅遂提出，這場戰爭中，明朝北京政府也是另一個戰場。見卜永堅，〈十六世紀朝鮮戰爭與明朝中央政治〉，《明代研究》28，2017年，頁39-64。

²⁹ 南浦文之，〈弔戰亡文〉，《南浦文集》（慶安本）卷中，頁8a-8b。

³⁰ 清·張廷玉等奉敕編，〈外國一·朝鮮〉，《明史》卷320，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8299。

自壬辰至戊戌，在朝鮮經寒暑者七，我士卒之死者不知幾百千，況朝鮮乎？嗚呼！時耶？命耶？人未可知。天地為愁，草木淒悲，若弔祭不至，精魂豈有依乎？不勝哀傷之至。循釋氏之法造立浮圖，以弔自他之精靈。且復祭以卑詞云：「天假援兵，令吾解難；提三尺劍，坐定胡漢。伏八萬尸，不終一旦。造立浮圖，以起悲嘆；看他萬靈，遍到彼岸。」³¹

南浦文之在描述戰爭弊端時，還是受到敵我兩方立場分判的影響，使他對戰爭描述有其特定的主觀立場。但這段「循釋氏之法造立浮圖，以弔（弔）自他之精靈」的陳述，卻是發自肺腑的慈悲情懷。他希望能為殞命戰場上的萬千生靈祈福致祭，他眼中的戰爭，固然是「功業」，但他也同時本著慈悲為懷的想法，關注戰爭中受苦受難的戰亡者。

其實對從軍將士悲憫之心的描述，在南浦文之的詩文中不時流露。如他在《南浦棹歌》裡，有題為〈聽高麗之訃音〉的詩作，同樣有著關懷遠方戰場將士的思考，傳達出南浦文之對逝去生命的哀情：

從軍未點視其存，訃信遙傳自塞垣。烏亦今朝豈無淚，聲聲啼血雨昏昏。³²

南浦文之之所以特別關懷這些離開家鄉的戰士生靈，或因他們在「東亞戰役」的背景下，須被迫來到離家千里之遙的戰場，以圖謀為國家建立功業，創造勝戰。但戰爭的慘酷，使他們之中許多人成為無法歸鄉的野鬼孤魂。南浦文之在這些征戰詩文裡流露出的悲憫，使他仍然保留佛家對生命的關懷。另外，他又有〈聞一將薨有感〉詩，同樣可呈現他對「戰爭」一事反省，詩云：

³¹ 南浦文之，〈弔戰亡文〉，《南浦文集》（慶安本）卷中，頁 7b-8a。

³² 南浦文之，〈聽高麗之訃音〉，《南浦棹歌》，鹿兒島大學圖書館玉里文庫藏鈔本，頁 42b。（原書為鈔本，共三冊，未標明頁數，此頁數為筆者按照原書裝訂序所加）

畜眾榮民幾出師，東西無處不平夷。封侯縱誓山河去，昨日尚榮今日衰。³³

對照〈弔戰亡文〉對豐臣秀吉的歌頌，南浦文之在此通過將軍功業的「昨日尚榮今日衰」，呈現他思想的反省意志。站在將領僚屬的立場上，他會頌揚對征伐與領土擴充的「功業」，但他也同時明白這些「東西無處不平夷」的功業就人間世而言，都將歸於虛幻。佛家對生命成住壞空歷程中的理解與關懷，在他對戰爭的觀照裡，仍然不時有所流露。

（二）對國際情勢的分析：詩文觀點中的慶長琉球之役（1609）

前述的萬曆朝鮮戰爭，雖是牽動東亞局勢的大事，但與南浦文之一生經歷更加息息相關的戰役，應屬後來 1609 年薩藩侵琉的慶長琉球之役。執掌外交文書的南浦文之雖未親自赴琉，但他所起草的諸種外交文書，必須有效傳達當時薩摩方對中、琉兩國的對外戰略與態度。廖肇亨曾考證指出《南浦文集》中的〈呈琉球國王書〉及〈呈大明天使書〉，撰寫於薩摩藩征琉前約三年左右。³⁴廖肇亨並指出當時明朝遣派、琉球冊封正使的夏子陽（1552-1610）、副使王士禎（號旭陽，泗水人）等人抵達琉球，原有意由琉球方派遣使者至日方，詢問關於日方所提出的通商要求細節。³⁵薩摩藩主島津家久因而遣派使者島原宗安親赴琉球，攜帶前述二封書信，當中對明朝「天使」，薩方語氣恭謹，希冀二國間能恢復通商；對琉球「國王」，薩方則語氣不遜，一方面再三強調意欲與中國通商的決心，一方面深責日、琉關係之惡化問題，鄭迴（1540-1611）實為禍首。如果把這些言論放回整個東亞戰爭情勢的脈絡，日、琉二方

³³ 南浦文之，〈聞一將薨有感〉，《南浦棹歌》，頁 34b。

³⁴ 廖肇亨，〈南浦文之與琉球王國〉，頁 153-164。此二封書信之內為見於南浦文之，〈呈琉球國王書〉，《南浦文集》（慶安本）卷中，頁 18b-19a；〈呈大明天使書〉，《南浦文集》（慶安本）卷中，頁 11b。

³⁵ 廖肇亨，〈南浦文之與琉球王國〉，頁 158。

關係之惡化，可能可以追溯到 1591 年薩摩藩島津義弘致書琉球尚寧王，指出豐臣秀吉將出兵征伐朝鮮，命令琉球須提供七千五百人十個月糧食。當時鄭迴認為此要求相當無理，不僅遣使向明朝報告日本有意從朝鮮入侵中國，另外也強烈主張應當堅拒日方。往後日琉關係，又因 1598 年琉球進貢船遇風漂至日本仙台事件，鄭迴同樣力主拒絕同意日方要求琉球應遣使向日本謝恩，因而早早埋下禍端，也導致後來鄭迴的殉國。³⁶

廖肇亨指出，雖然關於琉球侵攻的研究資料目前已經汗牛充棟，但南浦文之所代表的薩藩本位立場，往往是主流研究基本通過中、韓等官方文書記載建構之史觀所未及見處。南浦文之因總掌外交文書，在這場戰役中涉入程度甚深。而他用漢詩文所書寫的第一手之感受與觀點，正好能夠補充史書所無法傳遞出的日方動機與心理層面。³⁷南浦文之詩文集集中的〈討琉球詩並序〉，當中字字句句都充分傳達薩摩方對於琉球的強硬態度：

琉球小島一彈丸，天與人歸討不難。四海波平天水渡，諸軍大艦泰山安。

欲伐鬼方揚白旆，諸軍威武動乾坤。樺山右將平田左，添得伊川伴衛門。

一灯將滅琉球運，為舉邪那紀綱紊。諺語未知實耶虛，那霸本是河邊郡。（那霸，琉球國都也）

³⁶ 鄭迴或寫作鄭迴，為福建長樂鄭氏移民後裔。在中、薩、琉三方關係中，他對薩主戰，對中親善，這也導致琉球史籍將他寫為喪國佞臣，中方史家及部分琉球史學者猶視其為殉國忠臣。鄭迴抵抗薩藩的相關事蹟，可參看胡飛，《鄭迴抵抗薩摩侵略的研究》，中國海洋大學歷史地理學碩士論文，2015 年，頁 8-30。另外有關鄭迴歷史形象與不同文獻記載間所呈現的殊異評價，可參見呂青華，《琉球久米村人的民族學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論文，2008 年，頁 214-221。

³⁷ 廖肇亨，〈南浦文之與琉球王國〉，頁 157。

琉球祇合覓和談，心若君民更不甘。想是邪那瘦城主，一身逃死定降參。

我國武威誰敢侵，幾多健將智謀深。報言蜂蠆有其毒，須學貓兒藏爪心。

報恩主席我知音，句欲聯珠旦暮吟。緬想西來一庵主，無心雲亦駭其心。

典墳誓莫作秦坑，字字元如金滿籬。景叔春蘆昔遊日，先師書籍帶之行。

奇術誑人巫女流，巧言令色為身謀。虵蛇若識義兵至，端的尋聲自縮頭。

愚而偏詐世無雙，未敢翻心築受降。又似螳螂恃長臂，人言小點大癡邦。

自古球陽屬薩陽，不隨號令忽云亡。他時棄父棄妻後，必棹扁舟赴大唐。³⁸

第一首詩押平聲寒韻，提出「天與人歸」的寫作綱領。次首詩押平聲元韻，談軍容壯盛，將領威武。第三首至第五首分別押去聲問韻、平聲覃韻、平聲侵韻，都在說明琉球之失策，舉用「奸邪」且不願和談，必遭大患。然緊接著的「報恩主席我知音」、「典墳誓莫作秦坑」二首，卻說明自己有詩歌知交在琉球，而其同學景叔、春蘆等人，也曾入琉弘化，使其先師書籍傳播至該地。在一連串的威之以勢的詩歌後面，這兩首作品，點出東亞世界關係裡的多元性：在戰爭之外，薩、琉也曾頻繁以漢文與宗教相互交流，存在某種穩定的文教交流關係。然而更接下來押平聲尤韻和平聲江韻兩首詩作，卻分別用巫女巧言惑世、人心愚而偏詐等

³⁸ 南浦文之，〈討琉球詩並序〉，《南浦文集》（慶安本）卷下，頁 59b-62a，引文見 61b-62a。

書寫主題，強調琉球方的「他者性」，則戰爭書寫常見的「區分敵我」形式，至此昭然。最後一首則強調琉球王國為島津藩附庸的「嘉吉附庸說」，此說法反覆出現於薩摩方的文書與宣告裡。

南浦文之在這組詩的〈詩序〉中，是以「首章」、「次章」等語彙分別說明各詩詩旨，但整套〈討琉球詩〉有聯章之結構，韻部上卻平仄錯落，與中國詩歌之聯章模式不完全相伴。然而這組詩作觀點鮮明、詩風剛勁，南浦文之這樣篤定的態度，恰恰印證這些說法在當時流播深遠，幾可視為已深入薩藩陣營心中根深蒂固的政治宣傳。通過對這類說法的再三宣揚，薩摩方獲致「建立合理戰爭口徑」的效果。南浦文之強調薩琉戰役中，薩摩方的「天命與之」，並稱琉球之命運是「一灯將滅」——。而其禍源釁端，在於當中有人阻撓天命。在此詩之外，〈征伐琉球〉特別也強調薩摩方之所以要興師動眾地征伐琉球，是為了要矯治琉球方面的「特險偽心」。³⁹在〈己酉五月十八聞官軍唱凱歌，賦村詩嘲島囊心有表裡云〉詩中，南浦文之也再三強調作為征伐一方的薩藩，實具有「天之所與」的使命：

島夷方命事皆虛，特險偽心猶未除。動眾興師何歲月，維時己酉暮春初。⁴⁰

是歲何年球國頽，人民離散命乎哉，島囊表裏潤多少，容我數千軍衆來。⁴¹

想像遠民昏十方，中山王運盡茫茫，天之所與無人測，飽入資財括島囊。⁴²

³⁹ 對前揭詩作之解讀，亦可參酌廖肇亨，〈南浦文之與琉球王國〉，頁 153-157。

⁴⁰ 南浦文之，〈征伐琉球〉，《南浦棹歌》冊 1，頁 58b。

⁴¹ 南浦文之，〈己酉五月十八聞官軍唱凱歌，賦村詩嘲島囊心有表裡〉，《南浦文集》（慶安本）卷下，頁 39b-40a。

在這些特別傾向「官方」的宣戰口徑裡，南浦文之非常稱職地宣示官方對待此事的立場。但其實作為群體下的個體，南浦文之對於征伐之事的真正感受，通過下面數首詩，或許還另外透露些許不一樣的聲音。其一是收錄於玉里文庫鈔本的《南浦文集》中，詩題為〈官軍征南之日，嘆役吏之責，我賦二詩述懷云〉的詩作，詩云：

堪嗟旦暮吏來呵，誤繫微官漾世波。雖解夷齊采薇日，首陽山遠欲如何？⁴³

詩題雖云有「二詩」，但鈔本文集僅見抄錄一首。詩中頗以「旦暮來呵」的役吏為其煩憂之源。南浦文之以隱士伯夷及叔齊的意象提出設問，自陳雖有遠國去世之志，無奈「首陽山遠」，心慕而實則不可得，流露倦於官事的煩悶。另一首詩題為〈官吏責我無由塞之，使一奚奴從軍，因揮淚賦小詩〉的詩作，更露骨傳達南浦文之未必真的如此重視征伐之事，或者說征伐之事與他真正在乎的日常生活毫無關聯，其詩云：

奚奴常荷鋤，三畝幾菑畲，今去從軍後，為吾誰挽蔬？⁴⁴

⁴² 南浦文之，〈已酉五月十八聞官軍唱凱歌，賦村詩嘲島囊心有表裡〉，《南浦文集》（慶安本）卷下，頁 40a。

⁴³ 南浦文之，〈官軍征南之日，嘆役吏之責，我賦二詩述懷云〉，《南浦文集》（玉里本）卷下，頁 38a。

⁴⁴ 慶安本卷下目錄，將一百九十四首詩歌標目為「雜言百九十四」，見《南浦文集》（慶安本）卷下，頁 31a-53a。這些雜言詩多為漫興，各有詩題。但詩題與詩序常混寫，造成內容編次上的淆亂。引文詩作寬永本未見，慶安本則把「奚奴常荷鋤，三畝幾菑畲，今去從軍後，誰為吾挽蔬」當作「詩題」的後半。但細味文字，慶安本應是誤將「奚奴」以下二十字誤置於詩題。此處文獻斷句及詩作歸屬皆需校正。見南浦文之，〈官吏責我無由塞之，使一奚奴從軍，因揮淚賦小詩二首〉，《南浦文集》（慶安本）卷下，頁 48a。又筆者以《南浦戲言》鈔本覆核此作，《南浦戲言》將此詩題目寫作〈官吏責我無由塞之，使一奚奴從軍，因揮淚賦小詩〉，而非「二首」。見南浦文之，《南浦戲言》，鹿兒島大學圖書館藏玉里文庫鈔本，頁 39a。

鋤即耕田之農具，「菑」為開墾未滿一年的新田、「畚」則為開墾過兩、三年的田地。南浦文之藉由眼前這一方田地的細微變化，傳達出他對從軍「奚奴」離去的在乎與不捨。耕田挽蔬的平靜生活，如今卻因為征伐徵兵而不復從前。《南浦文集》綴於前詩後的另首七絕則云：

七十斛田秋不登，今年公役力難勝。眼前多少諸宗在，獨出夫丸此正興。⁴⁵

此詩亦是慨嘆農事廢輟無以為繼，與前一首五絕詩旨彷彿。「力難勝」之「勝」應讀平聲，是「承擔」與「承受」之意，「勝」與「興」皆屬下平十蒸韻。這首七絕是在說，奚奴從軍後，農事無由持續。此詩還使用了日語較慣用之詞彙，也展現東亞漢詩的語言趣味。諸宗（しよしゅう）指的是佛教各家宗派，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使用「紹述清涼，盛弘華嚴，兼通諸宗」等描述，用的就是這個意涵。⁴⁶「夫丸」（ぶまる）則指戰國時代原不屬於武士籍，卻被徵召入軍隊服役的「陣夫」。這裡採用緇流與陣夫的身分對比，強調當時官吏為了調遣軍隊而不得不大量徵兵。這已破壞了原本的社會經濟結構，也讓南浦文之揮淚感嘆這種因征伐導致良田輟耕的現象。南浦文之集中收錄大量由他起草的外交文書，但那是他站在職務本分，不得不為之「公務」與

⁴⁵ 前註述及慶安本編次淆亂的問題，按慶安本收錄此作時，為符合詩題的「二首」成數，故將「奚奴常荷鋤」一首當成詩題，而引文此作，則與繫於其後的另一首七絕「風俗常憂頹敗遄，人人左衽拍其肩，逸居飽食坐終日，隱此無名野草煙」被湊成「二首」。但「七十斛田秋不登」一首，和「奚奴常荷鋤」一詩的主題內容較接近。以《南浦戲言》覆核，「奚奴常荷鋤」和「七十斛田秋不登」二詩雖一五絕而一七絕，但被同繫於〈官吏責我無由塞之，使一奚奴從軍，因揮淚賦小詩〉題目之下。又「奚奴」一首也重複收錄於《南浦棹歌》中標題為〈感懷二十首〉中之第十五首。見南浦文之，《南浦棹歌》冊1，頁50a。

⁴⁶ 梁啟超著，潘光哲導讀，《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臺北：臺灣古籍，2005年，頁117。

「官事」。在他自己的個人生活裡，他通過詩文流露出比起官吏庶務或征伐大事，他更在乎「為吾誰挽疏」的「小事」，也懷念著社會原本的平和與寧靜。

南浦文之文集，因兼收其公務文書，往往會讓讀者以為南浦文之的真實立場與性格，一如當時驕矜滿志的征琉軍。⁴⁷然而這必須考量當時東亞國際秩序的立場衝突，以及南浦文之官路上的職責所在。這些公務文書的意義，在於充分表現南浦文之的學問才能，也昭示薩藩強烈的主張與立場，但此並非南浦文之個人生活細節的全部面向。南浦文之藉由詩文書寫所能留存的訊息，切換他自己在「公」與「私」兩方面的不同情感取向。僧侶筆下的戰爭視界，且恰恰依違在這公與私的切換間，具備雙重面向。《南浦文集》不乏對東亞情勢的銳利觀察和主觀見解，但亦有對戰爭將士的悲憫同情，以及對恢復平靜農耕社會秩序的期待。這些文字錯落的聲道，代表南浦文之個人身分的多元，以及在不同寫作企圖之漢詩文裡展現的殊異心境。更細緻全面地思考這些詩文的撰作語境及寫作企圖等，方是理解其多樣化且具雙重性詩文書寫特質的詮讀關鍵。

四、官路與修行之間

（一）官路公程不自由

如前所述，南浦文之的詩文，其實保有他個人嚮往的生活面貌，且

⁴⁷ 琉球自為一國，並未侵擾薩摩。而薩摩方卻以琉球並未繳納豐臣秀吉出兵朝鮮之軍費為藉口，出兵侵琉。這實質上是以強凌弱的非平行行為，背後亦涉及對琉球貿易利益的掠奪。南浦文之作為相關外交文書的起草者，所呈現的涉外態度，亦與歷史上薩摩征琉的動機一致。薩摩侵琉的實際動機，以及其前後的日琉關係，可參考米慶餘，《琉球歷史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61-81。

這部分尤常見於鈔本系統《南浦文集》的收錄文獻裡。當中諸多詩文都傳達出他深倦官事，也頗為自己公務與修行人雙重身分所困的心情。

有首寬永二年刊本、慶安二年刊本俱未見收，僅見於鈔本《南浦文集》的〈祭師父詩〉，即表現出這樣的情緒。其詩題并小序如下：

〈祭師父詩〉

夫以沙門之徒而奔馳於利市名門者，先哲之所以深戒也。予少之時，入一僧室薙法受戒，及其壯也，繫一官寺，東漂西泊，遍見公程，不見嚴規者，凡幾多年矣。先哲若在，可奈之何乎哉？顧若予者，先哲之一罪人也。是歲丙午，衲子自恣之日，偶隨於官舩，而在浪花之中，不得致祭於先師之精靈，況復於九族之亡魂乎？於是誦唐人之「欲把薔花不自由」之句，豈無感于懷乎？謹賦野詩一章，敢昭告師父之精靈，精靈有知，鑒我毋悃。西泊東漂官事頻，雖逢自恣未除塵。蓬窓深鎖坐舩底，不把薔花薦鬼神。⁴⁸

以詩序中「是歲丙午」之紀年推證，此詩寫於 1606 年。南浦文之在本應反省自我的「自恣日」當天，因公事而無法在當天遵照律法修持自身、自懺己非。但他通過這篇序文，談到自己因「繫一官寺」所導致的「東漂西泊」處境。當僧侶的身分被收納入政府的統治體系裡，固然有更多資源與影響力，卻也因而伴隨許多自己所未能預料到的雜務與官役。南浦文之對此頗有深悔，在往來覽島、京都各處的奔波路程裡，南浦文之深感自己數年間奔馳官場，即便他未必在乎所謂的名利，但名利已成為他的羈鎖。畢竟在這樣的瑣事消磨中，他真切感受到遠離修行的恐懼。「薔花」一句乃出自唐朝詩人柳宗元（773-819）的〈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詩，當時柳宗元身陷在「萬死投荒」的流放處境中，本想採薔花寄給故友曹侍御，然而在貶謫情境裡，一切似乎顯得有些身不由己。沈德潛（1673-1769）《唐詩別裁集》卷二十詮釋此詩云：「欲采薔花相贈，尚牽

⁴⁸ 南浦文之，〈祭師父詩〉，《南浦文集》（玉里本）冊 2，頁 42b-43a。

制不能自由，何以為情乎？」⁴⁹黃生在《唐詩摘抄》中亦云：「言己為職事所繫，不得自由，特托采蘋寓興，言欲涉瀟湘采蘋，而不得往，此意空與湘水俱深也。」⁵⁰這裡的瀟湘水被換成日本列島間的汪洋萬頃，但那種對「采蘋」的嚮往，正是南浦文之心裡的眷戀與憂懷。

這類倦於官事的書寫主題，在鈔本《南浦文集》中俯拾皆是。如〈一官銖重〉詩云：

官路今如欲上舟，趑趄難進久遲留。功成名遂知何歲？髣髴凋零又一秋。⁵¹

緊接〈一官銖重〉詩的〈自悔〉詩又云：

夙興夜寐日皇皇，偏見公程百事忙。十歲青燈一無用，噬臍早不業農桑。⁵²

同一冊頁後半的〈自笑〉云：

深愧此身纓世情，金門幾度候公卿。輕裘肥馬多誇富，唯有閒鷗不慕榮。⁵³

若詩作抄錄先後有以編年為序，這些作品都是作於琉球戰役後，也即南浦文之約莫五十歲左右。在外人眼中，此時執掌外交文書，官事繁忙的南浦文之，應當可說是「功成名遂」了。但他深切感受的卻是自己年華漸老，但公務繁忙，無暇兼顧自己最在乎的事物。〈自悔〉詩中的「十歲青燈」是他嚮往眷戀的修行生活，但此時已身陷官場中，心情正可與

⁴⁹ 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卷20，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275。

⁵⁰ 唐·柳宗元著，溫紹堃集評，《柳宗元詩歌箋釋集評》，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4年，頁172。

⁵¹ 見南浦文之，〈一官銖重〉，《南浦文集》（玉里本）冊2，頁5a。

⁵² 南浦文之，〈自悔〉，《南浦文集》（玉里本）冊2，頁5a。

⁵³ 南浦文之，〈自笑〉，《南浦文集》（玉里本）冊2，頁5b。

前一首〈祭師父詩〉的心境相互發明。即便南浦文之也深知名利是世間人追求的目標，但在這些詩作裡，他卻不斷在表達對自己逐漸遠離修行境界的憂慮。而對「王事」之倦怠，也在其己酉年（1609，慶長十四年，慶長征琉之役發生在此年）以後詩作中，有越發明確的表達。他也逐漸在鈔本系統相關詩作中，揭露自己心中真正的嚮往。

前文已有述及薩琉之間的密切往來，與當時諸種與東亞秩序息息相關的複雜歷史語境。但如果只以刊本文獻系統為據，南浦文之將僅以其強烈傳達薩摩本位的歷史觀點，和其征戰詩歌被記憶。但在鈔本《南浦文集》裡，一些與他私人內在情感更加密切相關的詩作，反而透顯不太一樣的思想線索。他〈小詩以寄琉球報恩主席〉一詩中，他通過這場薩、琉之間交接的筵席場景裡，隱隱然表達出他對當時「王事」的感嘆：

自古青雲更有涯，華棖廣廈幾成嗟。食前方丈勞王事，何若野僧三碗茶。⁵⁴

「食前方丈」和「野僧碗茶」的對比，凸顯富貴與安貧、勞於王事與自在修行的境界之異。珍饈玉饌的背後，牽扯太多政治上的盤算與擘謀。南浦文之作為多種外交文書的起草者，豈會不深知其中關竅。但作為薩藩幕僚的立場，他只能從私人友誼的角度，給予琉球來使們私人情感上的支持。這年夏秋之交間，他有不少詩作是紀錄下關於他與琉球方面出使代表，包括西來禪翁等人的特殊情誼。這正可補充前述〈征琉球詩〉裡「緬想西來一庵主」一句的寫作脈絡。在〈己酉八月初四，西日將謝，予衡門有高車，出而問之，球國西來禪翁與大里之主也。迎之接之，未舉舊話。將回其車。予知二翁之勤勞王事，而無其餘力，故不得挽而留之。嗚呼！二翁之勤勞所由來者，非一朝一夕之故，雖曰伊傳周召，豈

⁵⁴ 刊本系統《南浦文集》無此作，僅見於鈔本。南浦文之，〈自笑〉，《南浦文集》（玉里本）冊2，頁1b。

復有優劣乎哉！翌且賦詩，呈僑居之下〉：

相遇雖忻家國寧，堪嗟塵世似浮萍。祇知官事無餘力，日晚高車
不得停。⁵⁵

這裡的「相遇雖忻家國寧」，可謂婉曲之極。這些琉方代表的處境，南浦文之是深深明白的。他們兩方可用詩文交接，也可建立真正的友誼。卻對「官事」煩擾衝突無能為力。在這種情境之下的「塵世似浮萍」一句，遂顯得感慨良深。因此南浦文之在詩文裡，愈發把自己棲身的「山寺」比喻為隔離世情的空間。比如同樣是為接待琉球方而寫作的〈予也三日奉君之命侍球王於峻宇高堂，是夜在我山庵解衣盤礴，樂在其中矣。詩以述懷〉，詩云：

擎跽曲拳西又東，玉堂每日不忽忽。清貧本自有真樂，措枕泰山
蝸屋中。⁵⁶

擎跽曲拳，指跪拜之禮節，這裡以「玉堂」點題目中往來問聘、行禮如儀的「峻宇高堂」。身分與禮節代表王權的壓力，這毋寧是一種「世情」，綁縛了自由心靈，因此在山庵中卸下繁文縟節的一晚，或許才能放下這些使人繁擾的外事。南浦文之在詩文中，每每表述這種嚮往超脫這些世俗身分的想法，和我們僅以刊本《南浦文集》的大量公務文書所勾勒出的南浦文之形象，存在一定程度的落差。

⁵⁵ 刊本系統《南浦文集》亦未收此作，僅見於鈔本。南浦文之，〈己酉八月初四，西日將謝，予衡門有高車，出而問之，球國西來禪翁與大里之主也。迎之接之，未舉舊話。將回其車。予知二翁之勤勞王事，而無其餘力，故不得挽而留之。嗚呼！二翁之勤勞所由來者，非一朝一夕之故，雖曰伊傳周召，豈復有優劣乎哉！翌且賦詩，呈僑居之下〉，《南浦文集》（玉里本）冊2，頁2a。

⁵⁶ 《南浦文集》（玉里本）冊2，頁3a。

（二）歸來作野僧

雖然刊本系統亦有跡象，但「歸隱」成為重要詩文書寫主題的傾向，在鈔本文集系統中展現得愈發明顯。承接他對「王事」、「官事」的勞倦，歸隱成為南浦文之詩作中反覆出現的嚮往與意象。以下幾首詩，有些僅見於《南浦棹歌》，有些則見於玉里文庫鈔本《南浦文集》。但共同反映的，是南浦文之在經歷世塵後，對人間名利更加看淡，對於修行歸隱的生活態度更加堅定。在〈贈歸耕人〉中他明確比較「為官」與「歸隱」兩種人生選項的差異：

微官多似觸藩羝。出入無時動噬臍。歸隱如君又誰在。泥塗軒冕荷鋤犁。⁵⁷

這種在官路公程裡的掙扎和懺悔，每每入之於詩。而這些作品，又多僅被鈔本《南浦文集》保留。像是應是寫於戊申年（1608）的〈四月九日更獨坐，作懺悔詩〉，表現他感到自己「僧而多處俗」的痛苦，詩云：

隨世貌難枯，徒蹙眉與鬢。僧而多處俗，獨愧贗浮圖。⁵⁸

隔數日作的〈四月十一曉雨倚柱有所思〉則云：

此身何日出諸纏，倚柱尋思未暫眠。我不拒人人拒我，世情只和任天然。⁵⁹

與公程官事的牴牾，成為南浦文之心中最大煩惱。於是在壬子年（1612）左右，南浦文之決心拋開公務身分，回到他心心念念的山寺生活。即便此時已是頭童齒豁的老僧，但他仍在這一最終的解放中感到真正的愉悅。

⁵⁷ 南浦文之，〈贈歸耕人〉，《南浦棹歌》冊1，頁36a。

⁵⁸ 南浦文之，〈四月九日更獨坐，作懺悔詩〉，《南浦文集》（玉里本）冊2，頁31b。

⁵⁹ 南浦文之，〈四月十一曉雨倚柱有所思〉，《南浦文集》（玉里本）冊2，頁31b-32a。

在〈八月廿六日故寺歸來有漫興云〉組詩中，他連題二首詩，其一云：

官路三年不涉園，秋風吹老鬢多髭。憑誰告訴山靈去，莫勒移文截我轅。⁶⁰

其二云：

久繫微官未告歸，頭童齒豁事皆違。孤床蟋蟀聲將斷，九月於吾誰授衣。⁶¹

如果沒有前面種種倦於王事的書寫以為鋪墊，這些吟詠或許並不引人注意。認為只是尋常禪詩，僧人作出世之語，擬歸耕之態。但放在南浦文之的生命歷程裡，我們看到的卻是一個曾叱吒風雲，指揮天下的學問僧，卻不免會在詩文中流露對人間富貴與權勢名利羈絆的痛苦。在悉數擺脫俗務後，他最終能歸返到自己原來所屬的一方蒲團、一幢古寺裡，聽著暮鼓晨鐘、過著煮茶誦經的生活。而最後的這個修行人姿態，也成為南浦文之詩文中最雋永，也最動人的日常風景：

〈九月廿三夜有二首漫興〉

不待世間羅綺筵，蒲團紙上對陳編。秋風窓冷燈將盡，坐待晨鐘五百年。

未覺秋霜吹鬢顛，高歌一曲百憂蠲。小茅蘆裡有何好，飢則煎茶困則眠。⁶²

⁶⁰ 此作見於南浦文之，〈八月廿六日故寺歸來有漫興云〉，《南浦文集》（玉里本）冊2，頁50b。

⁶¹ 此作見於南浦文之，〈八月廿六日故寺歸來有漫興云〉，《南浦文集》（玉里本）冊2，頁50b。

⁶² 南浦文之，〈九月廿三有二首漫興〉，《南浦文集》（玉里本）冊2，頁50b-51a。

五、結論：觀看近世東亞佛教影響力的另一個視野

過去我們多仰賴傳記資料、二手紀錄，來認識南浦文之這個江戶初期的重要文化轉譯者。在傳記資料中反映出的南浦文之，是功業赫赫，才華蓋世之人。門徒無數，亦深受皇族貴冑的尊重與歡迎。其訓點與講學，更是形構今日日本漢學基礎的重要環節。他精彩生動撰寫的〈鐵炮記〉，也讓我們更深入了解到那個對未來充滿好奇的日本，如何從海洋帶來的贈予與偶然中，打開近世與世界相遇的過程。然而我們也常常困惑於，南浦文之過於廣博多元的身分，反而使他本身的思想風貌顯得難以捉摸。這樣一位於儒學、兵術和各種外學無所不窺的僧侶，與他相關的研究材料，至今幾乎都是關乎「世情」的種種面向。我們看到他的運籌帷幄、博學多聞，在東亞的交流史中，他也佔有一席之地，充分表現薩摩本位的史觀與立場。但他的緇流本色只在經歷中可看見，未能得之於其言其筆，我們也不易捕捉到他的言行事蹟中，有關於修行生活的風貌。

但通過多重版本比對後的《南浦文集》，解答了上述困惑。鈔本系統文獻中，南浦文之留下更多保存日常生活細節和內在心聲的詩作。詩作不是僅有用於詩文唱酬、使節交接的一面，亦有他自己個人內造生命境界的呈現。他在這些詩作中展現對修行生活的懷念，對公務纏身的擔憂。因此我們能在漢文文獻裡，同時讀到南浦文之與世情相牽絆，最後卻終不離開修行歸隱的不同面向。

近世東亞佛教文獻所涵蓋的豐富內容，並不僅僅關乎「佛教」本身，其所呈現的，正是整個近世東亞通過頻密的文化交流後，所展現的勃勃生機與文化生命力。和西方傳教士將西洋文化帶到世界的各個角落一樣，佛教文化圈，也為東亞世界帶來共通語言。日本近世佛教僧侶治學兼容並蓄，不自我設限於佛學樊籬內部的寬容文化精神，讓日本僧侶，也扮演著帶領日本走向廣袤知識世界的領航員與中介者。南浦文之的貢

獻，不僅為當時的日本，也為現在的我們，鑿開了一道看見世界的窗戶。使我們不僅能從自己習慣的文化圈來認識世界，也能從他所留下的漢文記載，打開「異域之眼」，看見不同文化相互影響、相互轉譯的痕跡。在他筆下，十六世紀末到十七世紀初間東亞史的「世界化」，並不是近現代才有的產物，而是留存在詩文中真實的跨國文化圖象。唯有放下國界、民族、乃至於不同宗教的樊籬，才能對那個硝煙年代的世界秩序，擁有更寬容與更精準的理解。

另外，《南浦文集》的文獻價值亦值得注意。正因為南浦文之廣博學問僧的形象與身分，使他的片言隻語得到較為完善的留存。而與島津家舊藏關係密切的玉里文庫，更有著珍貴的文獻價值。過去刊本系統的《南浦文集》內容，對於當時的外交局勢，戰爭布局，或是薩摩藩歷史，乃至江戶儒學的奠基等，都提供了絕佳視野與珍貴素材。通過佛教和漢字的共通媒介，讀者得以勾勒東亞世界的圖景，澄清過去官方歷史文獻記載所未及見也未能見的層面。本文則想更進一步指出，鈔本系統的南浦文之詩文著述，可以幫助我們一窺他的個人內在生命境界。曾經叱吒風雲的南浦文之，在鈔本《南浦文集》裡呈現嚮往修行的精神風貌。在參與諸多改變世界的大事後，他最終仍能保持自己修行初心，沒有忘記自己心靈的歸所，這是其不可忽視的僧人本色。無論是鈔本或刊本的《南浦文集》裡，我們可以讀到許多關於征伐、關於當時世界局勢、貿易往來的政治經濟材料。然而南浦文之沒有被公務及官程誤去他一生的初心。他仍在詩文裡保持對常民生活的熱情，對修行本業的不敢或忘。就像是滾動在荷葉上的露珠，百轉千迴後，仍未沒有離開葉片。即使遍歷世情，南浦文之最後仍反璞歸真，歸隱山寺，作為他人生雋永的尾聲。在世情與修行之間，南浦文之不離世間法，不破世間相。但他所展現最「撙人心者」的力量，或許是他最終回歸本我與真我，脫去一切名韁利鎖的決心，從而獲致了心靈的平靜與自由。

引用書目

（一）佛教典籍與古籍

《西征日記》，天荊，《続々群書類從》冊3，国書刊行会編，東京：続群書類從完成会，1970。

《明史》，清・張廷玉等奉敕編，北京：中華書局，1974。

《明琳朝鮮役從軍日記》，是琢明琳，《佐賀県史料集成》，佐賀：佐賀県立圖書館，佐賀県史編纂委員會編，1960。

《南浦文集》，南浦文之，東京：日本宮内廳書陵部藏，慶安二年〔1649〕中野道伴刊行本，簡稱《南浦文集》（慶安本）。

《南浦文集》，南浦文之，東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書藏，寛永二年〔1625〕古活字本，簡稱《南浦文集》（寛永本）。

《南浦文集》，南浦文之，鹿兒島：鹿兒島大學圖書館藏，玉里文庫鈔本，簡稱《南浦文集》（玉里本）。

《南浦棹歌》，南浦文之，鹿兒島：鹿兒島大學圖書館藏，玉里文庫鈔本。

《南浦戲言》，南浦文之，鹿兒島：鹿兒島大學圖書館藏，玉里文庫鈔本。

《柳宗元詩歌箋釋集評》，唐・柳宗元著，溫紹堃集評，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4。

《唐詩別裁集》，清・沈德潛，北京：中華書局，1975。

《朝鮮日々記》，慶念，《朝鮮學報》輯35，1965。

《漢學紀源》，伊地知季安，東京：歷史圖書社，1971年《新薩藩叢書》本。

（二）現代專書、論文

ト永堅，2017，〈十六世紀朝鮮戰爭與明朝中央政治〉，《明代研究》28，頁39-64。
上里隆史，2009，《琉日戦争一六〇九：島津氏の琉球侵攻》，沖繩：ボーダーインク。

久須本文雄，1992，《日本中世禅林の儒学》，東京：山喜房佛書林。

大江文城，1944，《本邦儒學史論攷》，大阪：全國書房。

井上哲次郎，1937，《日本朱子學派之哲學》，東京：富山房。

夫馬進著、伍躍譯，2010，《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使節視野中的中國・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日本文部省編，1988，《日本教育史資料》，東京：鳳文書館，初版明治 23 年（1890）復刻本。
- 北島万次，1990，《豐臣政權の對外認識と朝鮮侵略》，東京：校倉書房。
- 石守謙、廖肇亨編，2015，《轉接與跨界：東亞文化意象之傳佈》，臺北：允晨出版社。
- 伊藤幸司，2002，《中世日本の外交と禪宗》，東京：吉川弘文館。
- 宇田川武久，2015，〈ふたたび鉄炮伝來論：村井章介氏の批判に應える〉，《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190，頁 1-28。
- 朱謙之撰，1984，《老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
- 池内宏，1987，《文祿慶長の役》，東京：吉川弘文館。
- 米慶餘，1998，《琉球歴史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西村天四郎，1909，《日本宋學史》，東京：梁江堂書店。
- 吳政緯，2017，《從漢城到燕京：朝鮮使者眼中的東亞世界》，臺北：秀威資訊。
- 呂青華，2008，《琉球久米村人的民族學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論文。
- 李啟煌，1997，《文祿、慶長の役と東アジア》，京都：臨川書店。
- 村上雅孝，1994，〈文之玄昌と宋学——「周易伝義大全」の書き入れを通して見た——〉，《文化》57，頁 165-182。
- 村井章介，2012，《世界史のなかの戦国日本》，東京：筑摩書房。
- 村井章介，2013，《日本中世世界史論》，東京：岩波書店。
- 足利衍述，1932，《鎌倉室町時代之儒教》，東京：日本古典全集刊行會。
- 松浦章，2007，《江戸時代唐船による日中文化交流》，京都：思文閣。
- 松浦章著、孔穎編譯，2018，《海上絲綢之路與亞洲海域交流（15 世紀末-20 世紀初）》，鄭州：大象出版社。
- 胡飛，2015，《鄭廻抵抗薩摩侵略的研究》，中國海洋大學歷史地理學碩士論文。
- 孫衛國，2017，〈東亞視野中萬曆朝鮮之役的總結與反思〉，收入史學研究與中國史學的風格編委會編《史學研究與中國史學的風格：吳懷祺教授八十華誕賀壽文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頁 311-330。
- 徐興慶、劉序楓編，2018，《十七世紀の東アジア文化交流：黄檗宗を中心に》，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崔官著，金錦善、魏大海譯，2013，《壬辰倭亂——四百年前的朝鮮戰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梁啟超著，潘光哲導讀，2005，《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臺北：臺灣古籍。

陳武強、郭海東，2017，《明代中國琉球日本三國關係與東亞秩序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陳威璿，2019，〈日本近世初期禪僧朱學思想釐探：以薩南學派南浦文之為例〉，《國文學報》65，頁 265-294。

廖肇亨，2018，《倒吹無孔笛：明清佛教文化研究論集》，臺北：法鼓文化。

鄭潔西，2017，《跨境人員、情報網絡、封貢危機：萬曆朝鮮戰爭與 16 世紀末的東亞》，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羅麗馨，2015，〈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日軍軍中的傳教士與僧侶〉，《漢學研究》33：1，頁 163-198。

（三）網路資源

《平成 28 年度鹿児島大学附属図書館貴重書公開「玉里文庫善本展——国文学・薩摩・近衛家・蘭学・琉球——」圖錄》，<http://hdl.handle.net/10232/00029461>，2020/9/28。

日本國會圖書館，<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2532156>，2020/5/20。